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6 June 2020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第七十四届会议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年

议程项目 13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五周年

2020年6月24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先生题为“伟大胜利七十五周年：对历史和未来的共同责任”的文章(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31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涅边贾(签名)



2020年6月24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伟大胜利七十五周年：对历史和未来的共同责任

2020年6月19日

伟大的卫国战争已经结束 75 年。几代人在此期间成长起来。全球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苏联宣称取得战胜纳粹的史诗般压倒性胜利，并拯救了整个世界，而如今苏联已不复存在。这场战争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即使对参战者也是如此。那么，俄罗斯为什么将 5 月 9 日作为如此重大的节日加以庆祝？为什么 6 月 22 日让生活戛然而止并让人们觉得如鲠在喉？

答案通常是，这场战争在每个家史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句话的背后，有数百万人的命运、他们的苦难和丧亲之痛。这句话的背后，也有自豪、真理和追思。

这场战争给我父母带来可怕的苦痛，我两岁的弟弟维蒂亚在战争中死去，我母亲奇迹般活下来。我父亲尽管免于服现役，还是自愿保卫他的家乡。他做出了与数百万苏联公民相同的决定。他在涅夫斯基的皮塔乔克桥头堡战斗，身受重伤。岁月越久，我越觉得有必要和父母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生活细节。我内心珍藏着与父母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以及他们表现出的些许情感，因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我和我的同龄人认为，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他们的先辈不得不经受的痛苦和磨难。他们如何、为何坚持住并取得胜利？令全世界惊讶和赞叹的真正钢铁般意志力从何而来？当然，他们是为保卫家园、儿女、亲人和家庭而战。但对故乡和祖国的热爱让他们团结起来。这种深切刻骨的个人情感是我们民族本质的充分体现，也是我们英勇舍身打击纳粹的核心所在。

人们经常会想：当前的一代人将做什么？他们面对危机将如何作为？我亲眼看到年轻的医生和护士，有时是刚毕业的学生，赶赴前线拯救生命。我看到我们的军人在北高加索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战，在叙利亚战斗到底。他们如此年轻。在不朽的传奇第六空降连中，许多军人都是 19 或 20 岁。但是他们都证明了自己无愧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战士们为保卫祖国立下的功勋。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俄罗斯人民的特性之一是履行义务，在需要时不吝付出。无私、爱国主义、对家园、家庭和祖国的热爱等价值观至今仍是俄罗斯社会的基本要素。国家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以这些价值观为依托。

如今，我们有诞生于民间的新传统，比如不朽军团。这是纪念游行，象征着我们的感激之情，也象征着几代人之间生生不息的血脉联系。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手捧着捍卫祖国打败纳粹的亲人照片。这意味着这些亲人历经磨难的生活和牺牲，也意味着永不忘记他们传给我们的胜利。

面对过去和未来，我们的责任是竭尽全力防止此类可怕的悲剧重演。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写一篇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文章。我曾多次与世界领导人讨论过这个想法，他们都表示理解。在去年年底举行的独立国家联合体领导人峰会上，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必须让后人铭记，全体苏联人民在战胜纳粹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在这场英勇的战斗中并肩战斗。在那次峰会上，我还与我的同行们谈论了充满挑战的战前时期。

那次谈话在欧洲和广大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证明重温过去的教训必要而及时。同时，也出现了情绪爆发、没掩饰好的不安全感和大声指责。一些政家出于习惯急于宣称俄罗斯试图改写历史。然而，他们无法反驳一个事实或驳斥一个论点。顺便说一句，确实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对原始文件提出争议，这些文件不仅可在俄国档案中而且也可在外国档案中找到。

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审查世界大战背后的原因，反思世界大战的复杂事件、悲剧、胜利和教训，以及对我国和全世界的教训。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必须只关注档案资料和同时代人的证词，必须摒弃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化推测。

我想再次回顾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主要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决定。《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而言不啻为严重不公的象征。具体而言，这个国家将被掠夺，被迫向西方盟国支付拖垮其经济的巨额赔款。时任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对该条约的评价一语成谶：“这不是和平。这是 20 年的休战。”

正是国耻成为德国激进和复仇情绪的沃土。纳粹巧妙地玩弄这些情感，加强宣传，承诺将德国从“凡尔赛遗产”中拯救出来，恢复德国的昔日实力，而同时却将德国人民推入新的战争。匪夷所思的是，西方国家对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波助澜，尤其是联合王国和美国。他们的金融界和产业界积极投资德国生产军事物资的工厂。此外，许多贵族和政界人士支持在德国和欧洲兴起的激进、极右和民族主义运动。

“凡尔赛世界秩序”引发了许多隐藏的问题和公开冲突，其根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者任意确定新欧洲国家的边界。这些边界纳入地图之后不久，就出现了领土争端和竞相提出的主张。这些都变成了定时炸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成果之一建立国际联盟。在确保持久和平和集体安全方面，人们对这个国际组织寄予厚望。如果这个进步思想得到贯彻落实，毫不夸张地说可以防止再现全球战争的恐怖。

然而，事实证明被战胜国法国和联合王国把持的国际联盟没有实效，化为空谈。苏联一再呼吁建立公平的集体安全体系，并签署能够制止侵略的东欧和太平洋条约，而国际联盟和整个欧洲大陆对这些呼吁充耳不闻。这些提议被置之不理。

此外，国际联盟也未能防止世界各地发生冲突，包括意大利攻击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日本侵略中国和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等。另外，慕尼黑背叛事件不仅涉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涉及英国和法国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完全同意下被瓜分。在这方面，我想指出，斯大林与同时代许多其他欧洲领导人不同，没有因为亲自会见希特勒而名声受损，当时希特勒在西方圈子中被视为极受尊敬的政治家，而且是欧洲各国首都受欢迎的客人。

德国与波兰联合行动，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事先共同决定谁将得到哪些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1938年9月20日，波兰驻德国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向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通报希特勒所作的如下保证：“……如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我们在特申的利益发生冲突，德意志帝国将站在我们(波兰)这边。”这位纳粹领导人甚至暗示并建议波兰“只有在德国人占领苏台德之后”才采取行动。

波兰意识到，没有希特勒的支持，其吞并计划注定失败。在这方面，我想引用1938年10月1日德国驻华沙大使汉斯-阿道夫·冯·莫特克与约瑟夫·贝克之间的谈话记录，涉及波兰-捷克关系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该记录中写道：“贝克先生对慕尼黑会议上忠诚对待波兰利益以及捷克冲突期间两国关系的诚意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波兰)政府和民众极为赞赏元首兼帝国总理的立场。”

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很残忍，而且极为损人利己。慕尼黑摧毁了欧洲大陆仅存的哪怕是脆弱、徒有其表的保证，这表明双方协议毫无价值。正是慕尼黑背叛扣动了扳机，使得欧洲大战不可避免。

如今，欧洲政治家，尤其是波兰领导人，意欲掩盖慕尼黑背叛事件。原因何在？不仅因为他们的国家曾经违背承诺，支持慕尼黑背叛，一些国家甚至参与分赃，还因为回想起1938年那段戏剧性的日子里，苏联是唯一站出来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这让他们有点尴尬。

苏联依照其国际义务，包括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试图避免悲剧发生。与此同时，波兰则追求本国利益，竭力阻挠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在会见希特勒之前于1938年9月19日给上述约瑟夫·利普斯基大使的信中直接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波兰政府四次拒绝关于加入国际干预行动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

英国和当时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主要盟友的法国选择背弃他们所作的保证，放弃这个东欧国家，让它听天由命。更有甚者，他们甚至力图将纳粹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从而使德国和苏联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两败俱伤。

这就是西方“绥靖”政策的实质，不仅针对第三帝国，也针对所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其他参与者——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在远东，这一政策最终导致1939年夏天签署英日协定，纵容东京在中国为所欲为。欧洲列强不愿承认德国及其盟国对整个世界构成致命危险。他们希望战火不会殃及自身。

慕尼黑背叛向苏联表明，西方国家在处理安全问题时不会考虑苏联的利益，而且一有机会，就可能结成反苏阵线。

然而，苏联仍竭尽全力建立反希特勒联盟，但我再说一遍，西方国家还在两面下注。苏联领导人经情报机构收到 1939 年夏天英国和德国之间私下接触的详细信息。应指出，实际上在法国、英国和苏联三方谈判的同时，这些接触极为频繁，相形之下，西方伙伴刻意拖延谈判。在这方面，我将引用英国档案馆的一份文件。该文件载有对 1939 年 8 月到访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指示，其中直接指出，代表团应“非常缓慢地进行谈判”，而且“联合王国政府不准备承担任何详细规定的义务，进而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我还要指出，与英国和法国代表团不同，苏联代表团由红军最高指挥官率领，他们拥有必要的授权，可以“就组织英国、法国和苏联军事防御抗击侵略欧洲签订一项军事公约。”

波兰在这些谈判失败中起了作用，因为它不想对苏联方面承担任何义务。在西方盟友的压力下，波兰领导人甚至拒绝与红军联合行动对抗德国国防军的想法。只是在得知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后，约瑟夫·贝克才勉强间接通过法国外交官向苏联当局宣布：“……在采取联合行动对付德国侵略的情况下，波兰和苏联之间的合作并非不可能，但必须商定技术条件。”同时，他向他的同事解释说：“……我同意这一措辞只是为了策略上的便利，我们对苏联的最终核心立场保持不变。”

在此情形下，苏联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实际上是欧洲国家中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国家，而且还面临双线作战的真正威胁——与德国在西部，与日本在东部，在哈拉哈河上的激烈战斗已经在进行。

许多针对斯大林及其手下的指控都正当合理。我们记得该政权对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和大规模镇压的恐怖。如我上文所述，可以责备苏联领导人许多事情，但对外部威胁的性质认识不足不在其中。他们看到有人试图让苏联独自对付德国及其盟国。他们铭记这一真正的威胁，努力争取加强国家防御所需的宝贵时间。

当时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引起许多针对当代俄罗斯的评论和指责，都与那一时期情况有关。俄罗斯的确是苏联的合法继承国，苏联时期——包括其所有的胜利和悲剧——是我们千年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也要提醒大家，苏联对所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作出法律和道德上的评估。在 1989 年 12 月 24 日最高苏维埃决议中，正式谴责秘密议定书是“个人权力行为”，丝毫不反映“对这种勾结不负任何责任的苏联人民的意愿”。

然而，其他国家却宁愿忘记带有纳粹和西方政客签名的多个协议。现在也没有任何对这种合作进行法律或政治评估的迹象，包括一些欧洲政治家默许甚至直接鼓励纳粹的野蛮计划。只要记住波兰驻德国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在 1938 年 9 月 20 日与希特勒对话时所说的冷嘲热讽的话就够了：“……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我们(波兰人)将在华沙为他建造一座辉煌的纪念碑。”

此外，我们不知道一些国家与纳粹之间是否有“秘密议定书”或协议附件。我们只能相信他们的话。特别是，有关英德秘密会谈的材料仍未解密。因此，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加快公开档案的工作，并公布此前不为人知的战争期间和战前时期的文件——俄罗斯近年来一直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愿意进行广泛合作，并与历史研究人员共同开展联合研究项目。

但是让我们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事件。人们天真地认为，希特勒一旦搞定捷克斯洛伐克，就不会提出新的领土要求。这一次，领土主张涉及希特勒最近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帮凶——波兰。另一个凡尔赛的遗产，特别是所谓但泽走廊的命运，被用作借口。波兰当时遭受的悲剧完全归咎于时任波兰领导人，他们阻碍了英国、法国和苏联之间军事联盟的形成，并寄希望于西方伙伴的帮助，将本国人民置于希特勒毁灭性机器的高压之下。

德国的进攻完全遵循闪电战理念。尽管波兰军队进行了激烈的英勇抵抗，但在 1939 年 9 月 8 日——仅在战争爆发一周后——德国军队已经逼近华沙。到 9 月 17 日，波兰军事和政治精英逃到罗马尼亚，背叛了继续与入侵者作战的人民。

西方盟国辜负了波兰的希望。在对德国宣战后，法国军队仅向德国领土推进了几十公里，看起来只是在做姿态。此外，英法最高战争委员会于 1939 年 9 月 12 日在法国城市阿贝维尔举行第一次会议，鉴于波兰事态快速发展，决定完全停止进攻。这标志着臭名昭著的假战争的开始。英国和法国的所作所为公然背叛了他们对波兰的义务。

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德国将军们解释了他们在东线的快速成功。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原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承认：“……我们没有早在 1939 年就遭受失败，只是因为在我们与波兰作战时，驻扎在西部的的大约 110 个法国和英国师面对 23 个德国师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我要求从档案中查阅有关 1939 年 8 月和 9 月这段戏剧性的日子里苏联与德国接触的全部材料。根据这些文件，1939 年 8 月 23 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第 2 款规定，如果波兰各省进行领土政治重组，两国利益范围之间的边界将“大致沿纳雷夫河、维斯图拉河和桑河”延伸。换言之，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家园的土地，还包括历史上在维斯瓦河和布格河交汇处的波兰土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事实。

同样，很少有人知道，1939 年 9 月初进攻波兰后，柏林立即强烈并多次呼吁莫斯科加入军事行动。然而，苏联领导人无视这些呼吁，并计划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参与这戏剧性一幕。

只有当苏联绝对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和法国不会试图帮助他们的盟国，而德国国防军能够迅速占领整个波兰并进军明斯克郊区时，苏联才决定于 9 月 17 日上午派遣红军开进当时所称的东部边界线，即现在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部分领土。

显而易见，苏联别无选择，否则将面临极大增加的风险，因为——我再讲一遍——当时的苏波边境距离明斯克仅数十公里，苏联将不得不从非常不利的战略位置与纳粹进行这场无法避免的战争。数百万不同民族血统的人，包括居住在布列斯特和格罗德诺、普热梅希尔、利沃夫和威尔诺附近的犹太人，将会死在纳粹及其当地帮凶——反犹分子和激进民族主义者手中。

苏联力图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卷入日益严重的冲突，不愿意与德国为伍，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苏联和德国军队之间的真正对抗发生在比秘密议定书中商定的边界更往东的地方——不在维斯图拉河上，而是更接近寇松线，早在 1919 年三个协约国就建议将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

很难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说“本来可以不是这样”。我只说，1939 年 9 月，苏联领导人曾有机会将苏联的西部边界进一步西移，直到华沙，但他们决定不这样做。

德国人建议正式确定新的边界现状。1939 年 9 月 28 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德苏边界和友好条约》，以及关于变更国界的秘密议定书，承认变更后的国界为实际分界线，两国军队就驻扎在那里。

1939 年秋，苏联为追求其战略军事和防御目标，开始了并入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进程。这三个国家在民选当局同意的情况下，依照协议加入苏联。这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和国家法。此外，1939 年 10 月，原属于波兰的维尔纳市及其周边地区被归还给立陶宛。苏联境内的波罗的海共和国保留了它们的政府机构和语言，并在苏联高级政府机构中有代表。

在这几个月里，一直不间断地进行无形的外交和政治军事斗争及情报收集工作。莫斯科当局明白，它们正面临着一个凶残的敌人，反纳粹主义的秘密战争已经在进行。有人毫无根据地将当时的官方声明和正式的礼宾记录解读为苏联与德国“友谊”的证明。苏联不仅与德国，也与其他国家有着积极的贸易和技术联系。希特勒一次次试图将苏联拉入德国与英国的对抗中，但苏联政府立场坚定。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期间，希特勒最后一次试图说服苏联一起行动。但莫洛托夫严谨地遵循了斯大林的指示，仅限于就德国关于苏联加入 1940 年 9 月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署的针对英国和美国的三方条约的想法进行了一般性讨论。不足为奇的是，早在 11 月 17 日莫洛托夫苏联向驻伦敦全权代表伊万·麦斯基作了如下指示：“供你参考……在柏林没有签署或打算签署任何协议。我们只是在柏林交换了意见……仅此而已……显然，德国人和日本人似乎急于把我们推向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此事，因为我们认为德国方面的这种建议不合适。”11 月 25 日，苏联领导人彻底结束了这一切，正式向柏林提出了纳粹无法接受的条件，包括德国军队从芬兰撤军、保加利亚和苏联之间的互助协议以及其他一些条件。因此，苏联故意排除了加入该条约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立场铁定使希特勒产生了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到 12 月，希特勒不顾他的战略家们关于两线开战灾难性危险的警告，批准了巴巴罗萨行动。他这样做时明白，苏联是其在欧洲的主要反对力量，即将到来的东线战争将决定世界大战的结果。他仍坚信进军莫斯科将迅速取得成功。

我想强调指出：当时西方国家实际上同意苏联的行动方案，而且认可苏联努力确保国家安全。早在 1939 年 10 月 1 日，时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电台讲话中说，“俄罗斯奉行了一项冷酷的利己政策……但俄罗斯军队应该站在这条线上(指新的西部边界)，这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和抵御纳粹威胁显然有

必要。”1939年10月4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在上议院言时说：“……应该记得，苏联政府的行动是将边界基本上移至寇松伯爵在凡尔赛会议上建议的那条线上……我只引用历史事实，并认为这些事实无可争议。”英国著名政客和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强调，“俄罗斯军队占领了不属于波兰的领土，这些领土是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行夺取的……将俄罗斯的推进与德国的推进相提并论将是犯罪般的疯狂行为。”

在与苏联全权代表伊万·麦斯基的非正式交流中，英国高级政治家和外交官们的讲话更加公开。1939年10月17日，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巴特勒向他透露，英国政府认为不可能将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归还波兰。据他说，如果有可能创建一个规模适度、民族意义上的波兰，而且不仅得到苏联和德国的保证，还得到英国和法国的保证，英国政府就会感到相当满意。1939年10月27日，内维尔·张伯伦的高级顾问霍雷斯·威尔逊说，“波兰必须以其民族为基础恢复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不包括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话还试探了改善英苏关系的可能性。这些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为今后结盟和反希特勒联盟奠定了基础。温斯顿·丘吉尔在负责任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中脱颖而出，尽管他对苏联的厌恶众所周知，但他甚至在过去就支持与苏联合作。1939年5月，他在下议院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反侵略大联盟，我们将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最愚蠢的……将是……拒绝与苏联的任何自然合作……。”在欧洲敌对行动开始后，他在1939年10月6日与伊凡·麦斯基的会晤中吐露说，“英国和苏联之间没有严重问题，因此，没有理由出现紧张或令人不满意的关系。英国政府渴望发展……贸易关系，并愿意讨论任何其他可能改善关系的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夜之间、意外或顷刻间发生。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并非凭空而来。这场战争是当时世界政治中许多趋势和因素的结果。所有战前事件明确形成了一个致命链。但毫无疑问，预先确定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利己主义、懦弱、对侵略者日益强大的姑息以及政治精英们不愿意寻求妥协。

因此，声称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对莫斯科的两天访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不公平。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主要国家都应对战争的爆发负责。每个国家都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傲慢地认为可以智胜其它国家，保障自己的单边优势，或者远离即将到来的全球灾难。这种短视以及拒绝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和巨大损失。

我写这些，绝不打算扮演法官的角色，指责或为任何人开脱，更不想就历史进程发起新一轮国际信息对抗，这可能让各国和各国人民发生争执。我认为，应该通过各国一系列受人尊敬的学者的研究，努力对过去作出平衡的评估。我们都需要真相和客观。我自己一直而且始终鼓励我的同事们开展心平气和、开放和彼此信任的对话，以自我批评和不带偏见的方式审视共同的过去。这种方法有助于避免重蹈当年的覆辙，并确保未来和平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然而，我们的许多伙伴还不准备协同努力。相反，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正在增加对我国信息攻击的数量和规模，试图让我们为自己辩解，试图引起内疚，同时他们发表完全虚伪、出于政治动机的声明。例如，2019年9月19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关于《欧洲铭记历史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的决议，直接指责苏联与纳粹德国共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用说，其中根本没有提到慕尼黑。

我认为，这种“文本”——因为我不能将该决议称为文件——显然是为了挑起丑闻，是真正的危险。事实上，该决议由一个备受尊敬的机构通过。它说明了什么？非常不幸的是，它揭露了一个旨在破坏战后世界秩序的深思熟虑的政策。但建立该秩序曾是一些国家的荣誉和责任，这些国家的代表现在投票赞成这项欺骗性决议。因此，他们对纽伦堡法庭的结论和国际社会在1945年胜利后建立普遍国际机构的努力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我要提醒大家，正是由于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并对过去进行了认真的法律和政治评价，才使欧洲一体化进程本身成为可能，最终建立了欧洲议会等相关机构。凡故意质疑这一共识者，都是在破坏整个战后欧洲的基础。

除了对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构成威胁之外，这还引起了道德和伦理问题。亵渎和侮辱这一时期记忆是卑鄙行为。卑鄙可能是蓄意、虚伪和纯粹有意为之，比如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五周年的宣言中提到所有反希特勒联盟的参与者，唯独漏掉苏联。卑鄙可能是懦弱的，比如拆除为纪念抗击纳粹者树立的纪念碑，却喊着消除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这些虚假口号和指控占领，为这些可耻的行为开脱。卑鄙也可能是血腥的，比如新纳粹分子和班德拉后继者的反对者被杀害和烧死。卑鄙行为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同样令人厌恶。

忽视历史教训必将付出沉重代价。我们将在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基础上坚定地维护真理。我们将继续诚实、不带偏见地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这包括实施一个大规模项目，建立俄罗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前时期历史的档案记录、电影和照片资料的大量收藏。

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本文借鉴了许多新的、最近发现的或解密材料。在这方面，我可以坦诚布公地说，没有任何档案文件可以证实苏联打算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假设。确切地说，苏联军事领导人遵循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一旦发生侵略，红军将迎敌，发动进攻，并在敌方领土发动战争。然而，这些战略计划并不意味着打算先攻击德国。

当然，历史学家现在可查阅苏联和德国总部的军事规划文件和指示函。最后，我们知道事件的真实过程。许多人现在从这一知识的角度，争论该国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行动、错误和误判。在这方面，我要说一件事：苏联领导人在收到海量错误信息的同时，也收到了关于纳粹准备发动侵略的真实信息。在战前的几个月里，他们采取措施提高国家战备水平，包括秘密召集一些有义务服役的人进行军事训练，并将部队和预备役从国内军区重新部署到西部边境。

这场战争并不出人意料，大家都在等待中做准备。但纳粹攻击的破坏力确实空前。1941年6月22日，苏联面临世界上最强大、动员最充分、最训练有素的军队，几乎整个欧洲的工业、经济和军事潜力都在为它工作。不仅德国国防军，而且德国的仆从国，以及欧洲大陆许多其他国家的军事特遣队，都参与了这场致命的入侵。

1941年最严重的军事失败使苏联濒临灾难。必须恢复战斗力和控制力，为此采取极端手段，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加强国家和人民的所有努力。1941年夏天，数百万公民、数百家工厂和产业开始在敌人的炮火下撤离到国内东部。武器和弹药生产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在战争第一个冬天就已经开始供应前线。到1943年，苏联超过了德国及其盟国的军工产出。十八个月内，苏联人民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现在仍很难认识、理解和想象这些伟大的成就需要多么难以置信的努力、勇气和奉献。

苏联社会的巨大力量奋起反抗武装到牙齿的强大而冷血的纳粹入侵机器。苏联社会为保卫祖国团结起来，向破坏和践踏苏联和平生存、计划和希望的敌人复仇。

当然，在这场可怕而血腥的战争中，一些人被恐惧、困惑和绝望击垮。有背叛，也有临阵逃脱。革命和内战造成的严重分裂、虚无主义、对国家历史的嘲弄、布尔什维克试图强加的传统和信仰，尤其是在掌权后的头几年，所有这些都产生了影响。但是绝大多数苏联公民和海外同胞的态度不同，他们要拯救和保护祖国。这是一种真实的、不可抑制的冲动。人们在真正的爱国价值观中找到支持。

纳粹“战略家们”坚信，很容易让庞大的多族裔国家就范。他们认为，战争的突然爆发、战争的无情和难以忍受的苦难必将破坏种族间关系，国家可能会四分五裂。希特勒明确表示：“我们对生活在俄罗斯广袤土地上的人民的政策应该是促进任何形式的分歧和分裂。”

但是从一开始，纳粹的计划显然就已经失败。代表30多个族裔的守卫者为保护布列斯特要塞流完最后一滴血。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团结的实例，无论是在大规模决定性战役中，还是在保护每一个据点、每一米国土上。

伏尔加地区和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成了数百万疏散人员的家园。当地居民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并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帮助成为对敌人而言坚不可摧的堡垒。

无论现在谁试图证明什么，苏联和红军都为打败纳粹做出了主要和关键的贡献。这些英雄们在比亚韦斯托克和莫吉列夫、乌曼和基辅、维亚兹马和哈尔科夫的围困战中与敌人战斗到底。他们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库尔斯克和斯摩棱斯克附近发动进攻。他们解放了华沙、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和布拉格。他们攻占了柯尼希斯堡和柏林。

我们坚守真实、不加修饰或粉饰的战争真相。历经烈火和地狱般的前线考验的作家和诗人们告诉我们这一民族的人性真理：坚实、苦涩和无情。对我这代人以及对其他许多人而言，他们诚实而深刻的记述、小说、犀利的战士故事和诗歌

永远在我们灵魂中留下了印记，并留下遗产——向为胜利而竭尽全力的老兵致敬和缅怀阵亡将士。

至今，历山大-塔瓦洛夫斯基的朴素而伟大的诗句“我在勒热夫附近遇难……”仍然令人惊叹，这是献给苏联-德国前线中心伟大卫国战争血腥残酷战役参加者的一首诗。从 1941 年 10 月到 1943 年 3 月，仅在勒热夫战役和勒热夫突出部战役中，红军就损失了 1 342 888 人，其中包括在战斗中受伤和失踪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些从档案资料中收集的可怕、悲惨、不完整的数字。我这样做是为了缅怀已知和无名英雄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战后的岁月里很少或根本不被提及，这既不应该也不公平。

让我引用另一份文件。这是 1945 年 2 月由伊万·迈斯基领导的盟国赔偿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的报告。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战败的德国必须为战胜国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委员会的结论是，“德国在苏联战线上花费的士兵——日数至少是所有其他盟军战线的 10 倍。苏联战线还必须处理五分之四的德国坦克和约三分之二的德国飞机。”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军事行动中，苏联总共约占 75%。战争期间，红军“粉碎”了轴心国的 626 个师，其中 508 个是德国师。

1942 年 4 月 28 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对美国的讲话中说：“这些俄军已经摧毁并正在摧毁我们敌人的武装力量——军队、飞机、坦克和枪支，比所有其他盟国的总和还多。”温斯顿·丘吉尔在 1944 年 9 月 27 日给约瑟夫·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正是俄军撕碎了德国军事机器的内脏……”。

这种陈述在全世界引起共鸣。因为这些话是无人置疑的伟大真理。近 2 700 万苏联公民丧生，他们战死沙场，或死于德国狱中、饥饿和轰炸、贫民窟和纳粹死亡营熔炉中。苏联失去七分之一的公民，英国和美国分别是 1:127 和 1:320。遗憾的是，苏联最惨痛的损失并不是详尽的数字。我们必须继续下大力气还原所有死难者的姓名和故事——红军士兵、游击队员、地下战士、战俘和集中营囚犯，以及被敢死队杀害的平民。这是我们的义务。在这方面，搜寻运动成员、军事爱国者和志愿者协会会员以及保存档案文件的“人民的记忆”电子数据库等项目发挥了特殊作用。当然，为执行这种共同的人道主义任务，还需要密切的国际合作。

这一胜利是所有与共同敌人作战的国家和人民努力的结果。英国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与纳粹及其仆从国作战，保护自己的家园不被侵略。美英军队解放了意大利，开辟了第二战场。美国在太平洋重创侵略者。我们铭记中国人民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不会忘记“战斗法国”的战士，他们不理睬可耻的投降，继续与纳粹作战。

我们也将永远感激盟军提供的巨大援助，他们为红军提供的弹药、原料、食品和装备约占苏联军备生产总量的 7%。

苏联遭到攻击后，反希特勒联盟核心迅速开始形成，当时美英两国无条件支持苏联抗击希特勒的德国。在 1943 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结成大国联盟，并同意确定详尽的联盟外交和联合战略，一致对抗共同的致命威

胁。三巨头的领导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工业、资源和军事能力的联合将形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

苏联完全履行了对盟国的义务，而且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红军为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提供支持，在白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即巴格拉季昂行动。1945年1月，我们的士兵在强渡奥得河，终结了德国国防军在西线阿登的最后一次强大进攻。战胜德国三个月后，苏联完全按照《雅尔塔协定》，向日本宣战，打败了关东军的百万大军。

早在1941年7月，苏联领导人就宣布，“反法西斯压迫者的战争的目的不仅是消除笼罩我们国家的威胁，而且是帮助欧洲所有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桎梏下受苦的人民。”到1944年年中，几乎全部逐出苏联境内的敌人。但必须直捣敌巢，彻底将其消灭。于是，红军开始了在欧洲的解放任务，将所有国家从毁灭、奴役和大屠杀的恐怖中拯救出来。这些国家的得救是以成千上万苏联士兵的生命为代价。

同样重要的是，不应忘记苏联向被解放国家提供了巨大物质援助，以消除饥饿威胁及重建它们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当时战火从布列斯特一直蔓延到莫斯科和伏尔加河流域，绵延数千英里。例如，1945年5月，奥地利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粮食援助，因为它“不知如何在新的收获季节到来之前的七周内养活本国人民”。时任奥地利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卡尔·伦纳将苏联领导人同意运送食物描述为奥地利人没齿难忘的拯救行动。

盟国共同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以惩罚纳粹政治和战争罪犯。该法庭的裁决包含对种族灭绝、族裔和宗教清洗、反犹太主义和仇外等危害人类罪作出的明确法律定义。纽伦堡法庭还直接并明确地谴责纳粹的帮凶和形形色色的共犯。

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这种可耻的现象。贝当、基斯林、弗拉索夫、班德拉等人及其亲信和追随者虽然伪装成争取民族独立或摆脱共产主义的战士，但他们都是叛徒和刽子手。他们的残暴程度往往超过他们的主子。他们是特殊惩罚组成员，急于卖力，欣然执行最不人道的命令。他们应对诸如娘子谷枪击、沃利尼亚大屠杀、卡廷焚烧事件、屠杀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境内犹太人等血腥事件负责。

今天，我们的立场依然不变——纳粹同伙的犯罪行径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任何法定时效。因此，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国家中昔日因与纳粹合作而背上骂名的人突然间与二战老兵相提并论。我认为把解放者与占领者划等号是不可接受的。我只能认为美化纳粹同伙是对我们父辈和祖父辈记忆的反叛，是对团结各国人民抗击纳粹理想的背叛。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苏联、美国 and 英国领导人面临着一项历史性任务。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代表着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抱负、利益和文化的国家，但他们展现出极大的政治意愿，超越了紧张状况和偏好，并将真正的和平利益放在首位。因此，他们能够达成协议，实现造福全人类的解决方案。

战胜国留下的体系已经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和政治追求的典范。德黑兰、雅尔塔、旧金山和波茨坦等一系列会议奠定了 75 年没有全球战争的基础，尽管存在极为严重的紧张局势。

如今西方出现的主要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及其后果的历史修正主义很危险，因为它不无嘲讽地严重歪曲了对 1945 年雅尔塔会议和旧金山会议确定的和平发展原则的理解。雅尔塔会议和当时其他决定的主要历史成就在于，同意建立一个使主要大国得以继续在外交框架内解决分歧的机制。

二十世纪曾出现大规模全面的全球性冲突，1945 年，能够实际摧毁地球的核武器也进入人们的视野。换言之，以武力解决争端极其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明白这一点，也明白和意识到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1945 年吸取了国际联盟可悲的经验教训，以尽可能具体、有效保障和平的方式拟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结构。这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制度和作为其特权和责任的否决权的由来。

何谓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坦率地说，这是避免大国间直接对抗的唯一合理选择。五大国中的一国发表声明，称某项决定对它而言不可接受，与其利益和对正确方法的认知相左。其他国家即使不同意，也会将此作为既定立场加以接受，并放弃任何实现其单边抱负的尝试。这意味着必须以某种方式寻求妥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乎立即开始了新的全球对抗，有时非常激烈。冷战没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事实确证三巨头达成的协议有效。在创建联合国期间商定了行为守则，因而有可能进一步减少风险和控制对抗。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联合国系统承受压力，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但联合国仍然履行其主要职能。安理会的原则是防止大战或全球冲突的独特机制。

近年来经常有人呼吁废除否决权，取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特别机制，这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毕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联合国实质上将成为国际联盟——一个无法对世界事件进程施加任何影响力的空谈论坛。国际联盟的结局众所周知。这就是为什么战胜国极为审慎地搭建新的世界秩序，力求避免重蹈其前任的覆辙。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成果之一。只要有愿望和意愿，即使是最难以调和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等紧张状况，也不会阻碍我们找到和平共处和互动的形式。今天，世界正经历动荡时期。从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平衡到社会、国家甚至大陆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基础，一切都在变化。过去，如此巨大的转变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军事冲突，或为建立新的全球等级制度而进行的权力斗争。以盟国政治人物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建立了一套体系，防止历史上世界发展所固有的客观竞争的极端表现。

所有承担政治责任的人，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代表，有义务保证这一体系得到维持和改善。今天，如同 1945 年一样，重要的是展示政治意愿，共同讨论未来。我们的同事——习近平先生、马克龙先生、特朗普先生和约翰逊先

生——支持俄罗斯倡议召开同时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会议。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希望能够尽快举行这一面对面会议。

我们对即将举行的峰会议程有何设想？首先，我们认为，讨论在世界事务中制订集体原则的步骤将会有所助益。应开诚布公地谈论维护和平、加强全球和区域安全、战略军备控制以及共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其他重大挑战和威胁等问题。

会议议程上的一个特别项目是全球经济形势。首选是克服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我们各国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为陷入生活困境的公民提供支持。我们作为真正合作伙伴齐心协力的能力将决定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有多严重，全球经济将多快摆脱衰退。经济不得变成施压和对抗的工具。需要讨论的问题包括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确保全球信息空间的安全。

俄罗斯为即将举行的五国峰会提出的议程对我们各国和整个世界都极为重要和相关。我们对所有项目都有具体的想法和倡议。

毫无疑问，俄罗斯、中国、法国、美国和联合王国峰会将在寻找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和威胁的共同答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彰显对同盟精神以及我们父辈和祖父辈为之并肩战斗的崇高人文理想和价值观的共同承诺。

依托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彼此信任。这将成为进行成功谈判和协调行动的坚实基础，从而加强全球稳定和安全，实现所有国家的繁荣和福祉。毫不夸张地说，这构成我们对全世界和对今世后代的共同义务与责任。